

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走“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

邵 峰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浙江 杭州 310029)

摘要：“农民数量太多”是现阶段“三农”问题的焦点，而城市化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小城市是集聚农村人口、辐射城市文明的有效载体，因而也是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一股强劲力量。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则要求以大城市为载体，并形成由若干个大城市组成的大都市圈。如何解决两者的不一致性？作者提出了以卫星城为载体，走“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中间化”城市化；卫星城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城乡差别扩大已成为新世纪初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因素，而“三农”问题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内需不足，其根源是：农民收入太低、农民数量太多，这正是现阶段“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不仅强调了“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提出了解决现阶段“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和根本出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浙江实际出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着重解决好三方面问题：一是要以发展卫星城为重点，走“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为“减少农民”营造有效载体；二是要以发展中心村为重点，建设农村新社区，为以城带乡、促进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营造有效载体；三是要以给农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为核心，终结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新体制。本文重点是就城市化问题进行探讨。

1 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浙江的城市化

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城乡一体化。城市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前提，因为没有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的发展。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的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使城市化事实上成了一个“单向运动”，即人口和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流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农村人口进城落户）。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则是一个“双向运动”，它不仅有人口和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集聚，也有先进生产要素和先进文化由城镇向农村的辐射。这种“双向运动”的结果就是城乡一体化。近五年来，浙江省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对于提升工业化水平、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我们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去审视，就会发现，各地在实施《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误区，这种偏差和误区集中体现在重视生产要素的集聚、轻视农村人口的集聚，在减少农民、以城带乡、促进城乡一体化方面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作用。具体主要有以下四方面表现：

1.1 把城市化简单地当作城镇建设，忽视了农民的市民化

不少地方常常津津乐道于城镇建设，以为这就是城市化，而把农村人口的集聚这一城市化的核心却抛在了脑后。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在扩大城市规模、向城郊农民征用土地时，出现了“要地不要人”的现象，造成了一批生活没有稳定保障的“失地农民”。笔者以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适当扩大规模是必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农用地转变为城市非农建设用地、一部分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时必须同步实现一部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1.2 把城市化简单地当作行政区划调整，造成了虚假¹的城市化

笔者并不反对为了促进城市化而作必要的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从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2002年，浙江省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9%²，在常住人口中不仅包括了外省在浙江城镇就业的人口，不能准确地反映本省人口城市化水平，而且还包括了萧山、余杭、鄞州、金东、衢江等地撤县（市）建区、瓯海区范围扩大和众多的县（市）把乡镇改为街道后辖区内的所有人口，造成了不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因为在这些地方，原来的农村人口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这就给人造成了“城市化是并出来的”假象。

1.3 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到了发展大城市上³，形成了“摊大饼”式的扩大城市规模的态势

尽管在《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中体现了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展的方针与规划，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是出现了“大城市偏好”，简单地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需要大城市作平台。笔者并不否定大城市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浙江省到底有多少企业需要大城市呢？又有多少企业有实力进入大城市呢？⁴不仅如此，“大城市偏好”还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大城市病”。交通拥挤是大城市的一个突出问题，国外和国内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交通管理都难以克服这一问题⁵。地价上升是大城市的又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投资环境，使那些向往在大城市发展的企业望而却步，而且也使广大城市居民不得不把改善居住条件作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影响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更谈不上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哪怕是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职业，在城里购房落户，大城市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家。环境恶化也是大城市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仅空气、噪声、光、水、化学、垃圾等污染在大城市越来越严重，而且淡水资源越来越稀缺，过多地采集地下水会造成地表下沉，而长距离引水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由此可见，“大城市偏好”和“摊大饼”式的大城市建设，不仅会造成难以克服的“大城市病”，而且对于吸纳农民稳定地进城落户难以发挥作用。

1.4 重建轻改改革，在城乡二元结构⁶基础上又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社会结构”

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但是，由于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偏重于城市建设，而对城乡体制改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同步改变，城乡壁垒依然森严重重，不仅农民难以进城就业、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难以向农村辐射，反而在城市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新的二元社会结构”⁷表现为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明显差别，虽然在职业上他们都成了城市产业工人，但由于“农民工”没有改变其农民（peasant）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分配（工资）、再分配（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各方面上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成了城市中最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和介于城乡的“边缘人”。境况更加糟糕的是那些在“正规部门”⁸没有找到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农民工”，他们所从事的是“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职业不稳定，收入更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成了城市中事实上的“流民阶层”。

因此，从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浙江的城市化应着重发挥以下三方面功能：一是吸纳农民进城落户，为减少农民（farmer and peasant）提供现实有效的载体；二是提升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为壮大县域经济、扩大农民在农外就业提供良好的平台；三是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为促进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向农村辐射、让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共享城市现代文明提供有效的渠道。

2 “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与发展卫星城

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笔者理解，这种协调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协调，更重要的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的协调。从现阶段浙江的实际来看，城市化应顺应以下四个发展趋势：一是要顺应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在更快地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就业落户的同时，促进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二是要顺应工业化阶段提升的趋势。在更多地吸纳先进生产要素、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三是要顺应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全球大市场为导向，以提高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通过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各地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的广泛吸纳，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分工，使长江三角洲内部各城市组合成为优势互补、共生共荣的经济有机体和大都市圈。四是要顺应市民生活现代化的趋势。在促进城市居民就业与增加收入的同时，要为日益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提供居住舒适、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保障健全的生活条件，促进市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

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能够从整体上顺应这四大趋势？参照国外城市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笔者以为，浙江城市化应选择“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所谓“中间化”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和产业向处于中间层次的城镇集中的过程，它包括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大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向郊区的卫星城转移，即郊区化（suburbanization）⁹。这是一种由上向下分散的方向，或称为大城市向外扩散的方向。二是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继续向更大规模的城镇，主要是中等规模的城镇和大城市的郊区集中的方向。这是一种由下向上集中的方向，是城市化的传统演变方向。而能够较好符合这两个方向的载体，主要是把县城发展成为人口在50万人以下的中小规模的卫星城。也就是说，浙江的城市化要以发展卫星城为主要载体，形成“大城市——卫星城——中心镇”网络式的城市化格局。

所谓卫星城（satellite town），是指那些地处大都市周边、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与大都市的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且有密切联系的新兴城镇。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程来看，卫星城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郊区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出现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但是，从现代卫星城发展的趋势来看，卫星城不仅应具有“服务大城市”的传统功能，而且应具有“服务农村”的现代功能。也就是说，现代卫星城应具备四方面功能：一是疏散功能。即疏散大城市人口和产业。二是减压功能。即减轻大城市的环境压力。三是集聚功能。即集聚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四是辐射功能。即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

毫无疑问，浙江选择以卫星城为重点的“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不仅由于卫星城能够有机地疏散大城市的人口和产业，有利于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就业压力、住房压力、交通压力、环境压力等造成的“大城市病”，使生活在大城市和卫星城的市民都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而且由于卫星城“门槛”相对较低，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这里，笔者还想澄清三个问题：

一是现阶段浙江发展卫星城是否超越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国外的经验表明，郊区化一般出现在城市化水平达到 50%以后。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浙江城市化水平基本到了郊区化的阶段，而且那些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特大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大城市病”。即使是那些“大城市病”尚不明显，或者区域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 50%的地方，也可以未雨绸缪，根据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按照“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和“大城市——卫星城——中心镇”网络式的城市化格局，来进行规划和发展。这也可以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跨越式发展”。为什么非要等到“大城市病”困扰我们的时候，再来走这条路呢？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作为、且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二是浙江是不是所有的县城都能够发展成为卫星城？卫星城发展的历史表明，卫星城与“主城”在经济社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来看，浙江省的县城与其“主城”（一般为所在地级市的城市）并不是都有密切联系。但从经济全球化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大都市圈¹⁰将进一步形成。这种大都市圈由若干个分工与合作关系密切、又能相对独立发展的城市组成，以这些城市为“主城”又进一步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区域城镇体系，这样就把大多数的县城置于密切联系之中。因此，对于大多数县城来说，可以作为卫星城来建设和发展。

三是浙江是不是不需要发展大城市和中心镇？大城市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而且作为区域城镇体系的中心和卫星城的“主城”，无疑是需要的，浙江的地级市基本上应该发展成为人口超过 50 万人的大城市。只是大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进城落户的“门槛”较高，而且易产生难以克服的“大城市病”，特别是杭、宁、温等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特大城市应该是到了控制的时候了。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区域内诸个大城市的简单组合，而是要形成经济有机分工与协作的格局，这就必然要求以大城市为“龙头”、若干卫星城组成的区域城镇群共同参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中去。因此，仅将大城市作为浙江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和重点是有偏颇的。中心镇作为浙江省促进小城镇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的重要载体，由于其低门槛、乡土性和相对便利的交通等特点，在集聚农村人口和农村工商业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和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治理，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发挥城市带动辐射农村的“中介”作用。因此，浙江省仍然应当发展中心镇。但是，当前来看，随着市县两级新一轮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热的兴起，数量日益增多、有一定实力的企业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中心镇除了对那些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还有一定吸引力外，事实上中心镇发展处于产业支撑乏力状态，就业岗位十分有限，吸纳农村人口集聚的能力明显不足。不仅如此，中心镇在接受大城市人口和产业扩散时，由于自身规模的制约，接纳能力不强，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心镇集聚的人口和企业还将进一步向规模更大的中小城市转移。因此，下一步发展中心镇，应主要依托有较强实力的块状经济，那些地方不仅能够进一步吸纳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集聚，而且还可以接纳大城市人口和产业的扩散，甚至可以作为卫星城来发展。而在其他地方发展中心镇，将难以在集聚农村人口、农村企业和接纳大城市人口和产业中有大的作为。由此可见，走“中间化”的城市化道路，并不是不需要发展大城市和中心镇，只是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发展卫星城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综上所述，“中间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最经济、最现实、最有效的载体主要是将县城发展成为中小规模的卫星城。它可以把接受大城市人口和产业的扩散与吸纳农村人口和农村企业集聚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谓一举数得。

3 发展卫星城的对策

当前，发展卫星城、走“中间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形成网络式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应采取以下对策：

3.1 完善城镇体系规划，构画“大城市——卫星城——中心镇”的区域城镇体系

应按照城乡一体化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完善现有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一是要顺应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形成，按照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原则，重新定位大城市的布局及每个大城市的功能，使浙江的大城市都能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二是要顺应农村城镇化的要求，围绕大城市的发展，按照服务大城市与服务农村有机结合的原则，规划卫星城的布局及每个卫星城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城市——卫星城——中心镇”的区域城镇体系。三是要顺应郊区化的趋势，按照严格控制特大城市、适度发展大城市、大力发展卫星城、积极发展中心镇的原则，率先推进特大城市的郊区化和卫星城的规划建设，探索“中间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3.2 建设工业园区，营造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农村企业集聚的良好平台

应按照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中的分工与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分工，整体布局工业生产力。一是要按照长江三角洲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产业分工，围绕浙江各地特色工业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每个区域城镇体系的产业定位，并在每个区域城镇体系中，以卫星城（县城）为载体，建设一批工业园区，使卫星城成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战场”。二是要按照“退二进三”的要求，将大城市中适宜在卫星城发展的工业产业转移到卫星城的工业园区去，推进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使大城市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战场”。三是要按照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的要求，在卫星城或块状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建设特色工业园区，率先引导块状经济中的“龙头企业”落户到园区，带动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向园区集聚，进一步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格局，提升特色产业和块状经济的发展水平。

3.3 加快房地产开发和第三产业发展，营造大城市人口转移和农村人口集聚的良好载体

应按照提高生活质量的总体要求和“廉价、舒适、配套、多样”的要求，加快卫星城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房地产开发。一是围绕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和农村企业集聚，与工业园区相配套，推进卫星城的房地产开发，使那些随产业转移和企业集聚的人口尽快落户到卫星城。二是围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顺应人口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要求，在卫星城的不同地段，开发面积、结构、功能等各方面多种组合类型的房地产，满足大城市人口转移和农村人口集聚的不同需求。三是要按照扩大就业、优化服务的要求，加快卫星城的第三产业发展，为卫星城的企业和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良好服务环境，使第三产业成为卫星城居民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

3.4 推进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区文化建设，营造生产生活的良好条件

应顺应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区文化的建设水平。一是要按照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加快建设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和交通体系，并以大城市为核心向卫星城及广大农村地区延伸，提高基础设施的共享性。二是要按照现代城市“净化—→绿化—→园林化—→森林化”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生态型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卫星城的发展是造就生态型大城市的根本途径。应将大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与卫星城的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大城市的环境建设应从以美化环境为主转到优化生态为主上来，大力推进“城市森林”¹¹建设，使大城市成为自然、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物体系，使卫星城成为这一生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要

按照体现城市个性的要求，推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保护和发扬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特色，提高城市建设品位。

参考文献

- [1] 顾益康,邵峰. 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兼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1).
- [2] 齐良书. 发展经济学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 [3] 黄文忠. 上海卫星城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马力宏,邵峰,高抗著. 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 [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 [5] 上海市郊区工作委员会. 上海城乡一体化建设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Rethinking of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urbanization paths

SHAO Feng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9, China)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it, too many peasants, i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peasant at present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urbanization is a basic path to solve the matters. Medium-sized cities and small-sized cities are effective carriers to centralize rural population and radiate urba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y are also effective strength to drive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the integration of town and country. However, big cities should be asked to be carrier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ends and big metropolises should be formed by some big cities. How to solve the inconsistent argumen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urbanization paths, in which satellite towns should be asked to be carriers.

Key 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town and country;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urbanization paths; satellite town

收稿日期: 2003-05-24

作者简介: 邵峰 (1962 年生), 男 (汉族), 宁波人,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处长。

¹这里所谓的“虚假”，是指农村人口没有真正进城区落户而成为市民。

²城市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把外省在本省城镇就业人口计算在城镇常住人口和总人口中，而在总人口中扣除了本省在外省就业的人口。根据这种统计口径，2000 年浙江省城市化率为 48.67%。2002 年的城市化率与此同口径。

³我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为：人口在 20 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人口在 20—50 万人的为中等城市，人口在 50—100 万人的为大城市，人口在 100—300 万人的为特大城市，人口在 300 万人以上的为超大城市。此处笔者所指的“大城市”实际上是指那些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⁴块状经济是浙江的一大特色，其主体是中小企业，从单个企业来看，这种企业不仅大多数没有进入大城市落户的实力，而且一旦离开了块状经济的“块”，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难以发展。对企业来说，进入大城市，无非是为了获得信息、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和良好的政府服务，而这些在当今社会，对于卫星城来说，也不难做到。——笔者注。

⁵大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之所以难以克服，原因主要有：一是大城市的人口处于快速膨胀状态，庞大的人口使得交通拥挤在所难免；二是交通工具快速发展，个人和单位拥有的车辆的数量迅速扩大；三是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和就业市场化，使得人们变换工作岗位成为一种常态，而居住地却相对稳定，这就造成了城市内部人员流动量的扩大；四是住房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购置商品房，对于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新购房往往远离市中心，居住条件的改善往往以上班路程的扩大为代价，这也造成了城市内部人员流动量的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城市，如北京，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大，民警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而交通却越来越拥挤的原因。——笔者注。

⁶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占优势的农业部门与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前者位于农村，后者位于城市。

⁷“新的二元社会结构”与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内部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一样，它是指在城市中就业的“乡下人”与“城里人”并存的现象，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而托达罗所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笔者注。

⁸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将“正规部门”定义为那些正规的、现代化的工商业企业，而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正规部门”之外的从事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如个体商贩、人力车夫、搬运工、保姆、勤杂工、擦皮鞋者、家庭作坊的雇工、非熟练建筑工人等）的落后部门。

⁹郊区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向郊区（卫星城）迁移的过程，它是城市化经历了集聚、极化为主要特征的初级阶段后出现的以分散、辐射趋势不断加强为特征的高级阶段（一般发生在城市化水平达到 50%以后），是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国外学者有的也称郊区化为“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向农村回归，也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向农村回归，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与“郊区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郊区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郊区社区转化为城市社区、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农业生产者转化为非农生产者、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郊区的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非农业产业比重快速提高、农村生活方式快速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它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一种集聚、极化现象。——笔者注。

¹⁰根据国外的经验，都市圈通常具有四方面特征：一是由一至二个人口规模超过 200 万人的特大城市为中心，其 GDP 占整个都市圈的比重一般超过 1/3 到 1/2，是整个都市圈的核心；二是环绕中心城市，都市圈的大中小城市基本呈圈层状结构布局，且体系规模相对合理；三是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十分密切，其产业结构呈现综合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结构转换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但都市圈与都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四是都市圈具有密集的基础设施网络，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有序延伸。——笔者注。

¹¹“森林城市”概念首创于 1962 年肯尼迪政府的户外娱乐资源调查报告。1974 年，在英国举行的第五次国际林业会议肯定了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城市内部的绿化，也包括城市周围的城郊林带，以及城市外围以森林为主的林地。